

中华

传统文化

中华 古诗 观止

观

止

丛

书



中华古诗观止

上

◎
观止丛书
中华传统文化

◎





中华古诗观止

(下)

中华传统文化
观止丛书



中华古诗观止

总 策 划 雷群明 陈达凯

编 者 马美信等

特约审稿 汪贤度

责任编辑 褚大为 钱丽明 叶 丰

特约审校 王仲三

责任校对 林敢荣

装帧设计 陶雪华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0
字 数 1400000
版 次 1995 年 12 月 第一版
印 次 1996 年 8 月 第二次印刷
印 数 5001—11000

书 号 ISBN 7-80616-080-9/I·34

定 价 79.00 元(上、下册)

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

专家委员会

万云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水照	复旦大学教授
王运熙	复旦大学教授
王季思	中山大学教授
卞孝萱	南京大学教授
冯其庸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阴法鲁	北京大学教授
严迪昌	苏州大学教授
杨伯峻	中华书局编审
苏渊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吴小如	北京大学教授
吴晓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吴调公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余冠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中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陈貽焮	北京大学教授
周勋初	南京大学教授
周振甫	中华书局编审
郭预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施蛰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顾易生	复旦大学教授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黄天骥	中山大学教授
褚斌杰	北京大学教授

选 目 者

马美信	汪涌豪	刘明今	贺圣遂
钱振民	邬国平		

撰 稿 者

丁曦林	马美信	王国伟	王晓华
王瑞明	朱 伟	刘明今	刘明浩
邬国平	吴 格	汪树清	汪涌豪
陆 灏	邵文洁	郑利华	郑逸文
钱振民	耿百鸣	徐时仪	郭 建
黄 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止丛书

出版前言

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要让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了解历史，了解祖国，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激发爱国主义的热烈情感，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用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中所蕴含的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传统美德，教育、感染广大青少年。为此，我社决定出版一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止系列丛书。

中国有五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先人给我们积累了数以十万计的文化典籍。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但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面对比我们少得不知多少的典籍，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应该承认，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试想，以几十年匆匆的生命，要想览尽无涯的历代典籍，吸尽知识海洋，怎么可能？更何况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有那么多现代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吸收。

我们要珍视五千年文明史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因此，需要了解，需要继承；

我们又不能全盘照收五千年积累的文化遗产，因此，需要选择，需要剔除。

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必须进行的艰难的选择。

试着解决这种矛盾，我们策划了这套观止丛书。

所谓“观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叹为观止”，即所收的内容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东西。二是“观到此

为止”，即一般的中等文化水平及以上的读者，只要拥有它，便可“尝一脔而知全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如果不想作专门的研究，即可到此为止，庶几不至于有“数典忘祖”的危险。如果有人要继续深造，也可以此为出发点，登堂入室，到传统文化的大海中去搏击遨游。

为此，我们设想，这套观止丛书的选收范围上自先秦，下迄清末民初，以古典文学为主，兼及艺术、音乐、美术、历史、科学等，分专题出版，总计约收一千万字。以每天读五千字计，大约七年时间即可从头到尾读完。对普通读者来说，也许还是太多了一点。但中华传统的文化宝库实在过于丰富，再少便很难反映其真实面貌。好在对于不同的读者，仍完全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读，或把它们当作准工具书查阅，还是有着相当广阔的选择自由的。

为了保证这套观止丛书的代表性与权威性，编者与本社同人努力做到：一、选目尽量求精。除各书均由中青年骨干学者实际操作外，还特聘全国著名的学者、专家主持选目工作。不仅收入脍炙人口的名作，还努力发掘新的内容。二、评注尽量简明。以原作为主，不搞喧宾夺主的“鉴赏”，也不搞“今译”，让读者享受一种自己咀嚼、消化的乐趣。三、适当加入附录。主要是资料性的内容，与正文互为补充，藉以为读者提供方便。四、装帧尽量精美，使之既可供实用，又能成为居室的美化装潢品和赠送的礼品和奖品。

这套观止丛书将分批推出，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第一辑：《中华古文观止》、《中华古诗观止》、《中华古词观止》、《中华古曲观止》。这里所说的“古”，是“古代”的意思，想必读者一定能够理解。

希望这套书能为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做出小小的贡献。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多提意见和建议，以便不断修订，做到精益求精。

前 言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优秀文化遗产，诗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和研究古典诗歌，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文化素养，培养审美情趣，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是不可缺少的借鉴。然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浩如瀚海，任何人穷其一生，也只能涉猎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当前，随着弘扬民族文化高潮的兴起，人们更加迫切地希望用较短的时间阅读更多的好诗，于是各类诗歌选本，尤其是形形色色的鉴赏词典大量涌现。学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华古诗观止》，以其观赏性和学术性相结合，力求雅俗共赏而表现出与其他诗歌选本不同的特色。它既给广大爱好中国古代诗歌的读者提供一种简易方便的读本，又为学习和研究古代诗歌史的同志提供带有导向性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中华古诗观止》是一部通代的诗歌总集，起自《诗经》、《楚辞》，止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作品，是目前历史跨度最大、收入作家作品最多的一部诗选，基本上包举了古代诗歌的精华。

《中华古诗观止》通过所选诗歌及其评价，反映了不同时期各种诗歌流派产生、演变、融合的过程，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轮廓。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之说不足信，但《诗经》经过文人的删节改编是没有问题的。《诗经》与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学不同，很少宗教神话的色彩。它始终执著地关注着人生。《诗经》中许多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描写了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些表达现实生活苦难的诗，具有一种与后来同类作品不同的倾向，即对人类强烈的自信心。它们追求自由合理的社会，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认为这些和谐秩序的建立不是依靠宗教和神灵，而是依靠“圣人”推行的开明政治。这种对现实的关心和参与，成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中有大量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有的表现相思之苦，显示出古代人民单纯开朗的性格和纯洁质朴的心灵。这些富有情趣的诗篇，遭到后世不同的曲解，硬将情诗与政治挂起钩来，其本意要抬高《诗经》在经典中的地位，实质上降低了《诗经》的文学价值。

《诗经》之后，诗坛冷落了二百多年，直到战国后期，南方产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才升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并受到《诗经》的影响。它充满奇异的想象和炽烈的情感，是保留着远古神话的南方巫术文化体系的代表。它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口语，描绘楚国的名山大川、奇花异草，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都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表现出鲜明个性的伟大诗人。《离骚》是他用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它把人生的价值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了诗人不屈不挠地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形成的完美人格。这种对

个人价值的思考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成为后代诗歌的主要思想倾向之一。

楚辞在汉代逐渐向赋体演变,而乐府民歌则以其刚健清新的风格和生动活泼的样式在诗坛崛起。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国风》里没有叙事诗,乐府民歌却有不少出色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则代表了汉乐府诗发展的顶峰。汉乐府没有产生西方史诗式的长篇巨制,而是截取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问题,或是描述个人的悲欢离合。在叙事中带有强列的抒情色彩,是乐府叙事诗,也是中国古代叙事诗的重要特点。

汉乐府中还有不少爱情作品,它们表现了青年人,尤其是妇女反抗礼教束缚,追求坚贞爱情和幸福婚姻的炽热感情,其粗犷热烈超出了《诗经》。

汉乐府民歌的作品数量不多,对中国文人诗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文人模仿乐府民歌创作的“古诗”,主要抒写游子失志彷徨和思妇离别相思之情,表现了当时中下层文人对现实不满、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但作者对生命的思索却要比以往诗歌更深入。他们深感人生如寄,寿命短促,因而或主张追求功名富贵,或宣扬及时行乐。在他们的诗中,时常发出绝望的哀鸣和怨愤,流露出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不安情绪。这种情绪,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被放大了。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兴趣普遍提高。诗歌逐渐从政治和教化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取得独立的地位。诗歌创作主要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抒发自己的感情,获得心灵上的快慰。曹植是第一个致力于抒情诗的创作,并在诗中表现自我的诗人。他的诗抒写自己飘零的身世、遭受压制的哀愁、对人生短暂的悲叹,追求自由与解脱的心境。这种精神对魏晋南北朝的诗

歌创作,尤其是对阮籍和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阮籍《咏怀诗》的主题集中于对短促人生的思索。阮籍把这种个人的哀乐扩大到人类的全体,以更广阔的视野来探索人生的价值,从而使他的诗带有更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和凄凉悲哀的孤独感。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敌意的争斗是导致人类不幸的原因,而人类的自相残害多是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若要保全性命,免遭不幸,就必须弃富贵就贫贱,全身远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游仙——追求神仙生活是最好的解脱。

陶渊明不像阮籍那样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把这种思想融化在诗的意境里,将文学的形象性和哲学的思辨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在清简平淡的风格中蕴藏着深沉的忧患和炽烈的感情。他不满社会的黑暗,却又无法改变现实,于是退隐田园,寄情山水醇酒之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笔下的大自然是悠然的,诗人的心境也是悠然的。人生的感叹和政治忧伤,都在对田园生活的质朴爱恋中得到了安息。

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成熟定型,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派别分立,思潮活跃,给唐代诗坛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唐代自建国至安史之乱前一百多年间,天下富足,国势强盛,人们的才能和个性得到了比较自由的发展和表现。反映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满对生活的自信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跳动着热情的火焰。在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中,诗人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描写山水田园风光,是当时诗歌的另一重要主题。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反映出诗人宁谧的心境,给人以美好的享受。李白是唐代前期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

表。他充分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奋斗,又具有豪迈傲岸的性格,不愿损害自己的人格去迎合封建统治者,把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敏感地领略到人生及自然界的种种变幻和无常,厌恶现实的鄙俗,反抗封建传统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超越和生命的永恒,在诗歌中表现出纵情狂放的浪漫主义精神。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诗歌创作中浪漫主义的热情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一些人缅怀昔日的繁荣,在诗中弹奏着哀怨低沉的音调,失去了以往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少数人仍抱着救世的热情,面对惨淡的人生,为祖国的安危、人民的疾苦而歌唱。杜甫便是这样的伟大诗人。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位诗人像杜甫那样对国家民族怀着如此深挚的爱,对人民怀着如此深切的同情。杜甫从儒家观念出发,自觉地把诗歌创作服从于社会的政治和教化,但他的诗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把文学与政治结合得最成功的例子。

继杜甫之后,白居易在叙事诗创作上作出贡献,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提倡通俗浅显的风格,掀起了“新乐府运动”。由于过分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忽视了诗歌的艺术规律,“新乐府”在当时并未取得很高的成就。晚唐时期的诗人则走向另一极端,致力于诗歌艺术形式的锤炼,追求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为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宋代诗人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形成宋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北宋初年的诗歌创作还未脱出唐诗窠臼,王禹偁、徐铉等人师法白居易和贾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仿效李商隐;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针对西体雕琢藻饰的弊病,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力求摆脱唐诗的风调,诗歌创作具有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散文化扩大了诗歌的描写范围,对事物的刻画更加

精细详尽，增加了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宋诗多议论，有些诗能通过形象表现一定的哲理，多数诗写得枯燥无味，缺乏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为纠正宋诗浅露俚俗的弊病，作诗力求艰涩奇硬，专从古代著作中搜寻作诗的材料和词句。这种“资书以为诗”的习气既破坏了诗歌形象的鲜明和完整性，也妨害了诗歌更切近地反映现实生活。到南宋后期的四灵体和江湖派，重新提出学习唐诗，但他们或刻意雕琢，取径太狭；或嘲弄风月，气格卑弱，都没有太大的成就。宋诗散文化的倾向，使诗理胜于情，在形式技巧上刻意地求新，限制了作者感情的自由倾泻。因而宋诗表现的感情是平缓流动的，缺乏唐诗喷薄而出的火一般的激情。

历来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是仅从整体而言，也有不受此限制的作家，苏轼和陆游就是如此。苏轼和李白一样，有济苍生的政治抱负，有不受礼法束缚的豪放性格和超逸不群的才情。但是，苏轼不像李白那样，在诗中流露出强烈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热情，在他那些豪放旷达的诗里深藏着对人生怀疑和失望的深沉悲哀。陆游的诗继承了杜甫伤时爱国、不忘世事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从诗歌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陆游不及杜诗；从诗歌的艺术成就来说，陆游作诗太多，不免草率，气势有余而含蕴不足，不像杜诗那样浑然天成，感情深沉真切。

元代以后的诗歌，崇唐学宋，很难超脱前人的窠臼。元人学唐诗，偏重晚唐的路子，尚能得其几分精髓；明人学唐诗，推崇盛唐，亦步亦趋，仅得其貌而遗其神。因而后人对明诗多加非议，讥笑它是“假古董”。明代诗歌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它表现出来的新的思想倾向，却不容忽视。元末明初，杨维桢、高启的诗，已经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对生活欲望的追求。到明代中后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样的思想意识在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以唐寅为代

表的吴中诗人蔑视礼法和传统,在诗歌中表现了自由解放的个性。但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现实享乐主义者,在他们诗中更多地表现出人生的欢乐。他们描写市民的世俗生活,不仅内容是新鲜活泼的,而且显示出与传统不一致的审美观念。与此同时,北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诗人倡导诗学盛唐的复古运动,其目的是反对宋代的理学诗,使诗歌能更自由地抒发感情。晚明以袁宏道为核心的公安派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分别继承了李梦阳和吴中诗人的精神,掀起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公安派的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冲破传统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他们在诗歌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人们应不受束缚地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人的才能和个性只有在追求欲望满足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诗歌艺术形式上,公安派提倡浅显通俗,向民歌靠拢,并且进行了白话诗创作的尝试。公安派发动的诗歌革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取得成功,转了一个圈子,最终又回到传统的道路上来。

明末清初,诗人们把反映社会的矛盾斗争作为诗歌的首要任务。明亡后,遗民们在诗歌中寄托对前朝的哀思,表现在异族统治下汉族人民的苦难,闪耀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同时又流露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当时诗人们强调的是社会责任感,而不是个性的自由和解放。然而,晚明诗歌中的反传统精神并未断绝,在袁枚等人的诗歌中得到了发扬。随着清代社会的安定,诗人们的热情消失了,除了黄仲则等少数诗人还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大多数诗人埋首于诗歌形式技巧的推敲。尊唐崇宋,流派多变,门户林立,莫衷一是,诗坛表面的繁荣遮盖不住思想内容的空虚。龚自珍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诗人,又是近代社会的第一个诗人。他的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既有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又透露出对光明、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反映出诗人处于社会转折关头时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表

现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扼杀和摧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诗人们目睹时世艰难,作诗多愤世哀时之音,诗风求新求变。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掀起的“诗界革命”,努力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把诗歌创作和社会生活、政治事件密切结合起来。“诗界革命”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样,仅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不可能产生与传统诗歌有本质区别的新诗,创造新诗体的任务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能完成。

以上是《中华古诗观止》所勾勒出的中国诗歌发展的轨迹,反映了本书编选者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总体认识和评价,其中有些观点不囿传统,颇多创见,使此书的篇目和题解具有新意。书中的题解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诗歌演变的现象和原因,若将每首诗的题解连缀成篇,就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诗歌史。本诗的选目,也具有独特的眼光,体现了编选者的文学观点。如魏晋时期的游仙诗,表现了相当一部分作家厌弃现实对个性的束缚,追求人格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永恒意念,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想象瑰丽奇特、笔力恣肆纵横的作品。以往的文学史着重批评游仙诗中流露的人生如梦的厌世情绪和逃离现实的消极态度,一些选本也很少收这类诗。此书收入了几首有代表性的游仙诗,并给以公正的评价。又如白居易的歌行和闲适诗在当时流传很广,作者亦以此自重,而讽谕诗却不受重视。后来的选家为了突出“新乐府运动”,在选白诗时讽谕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此书在收入白诗时,兼顾长篇章歌行、闲适诗和讽谕诗,前两者占了较大的比重。以往的通代选本,明清诗的比例很小,尤其是明诗,历来被认为上不及元诗,下不及清诗,遭到选家的排斥。此书的编选者充分考虑到明诗的独特价值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影响,对于李梦阳、徐谓、唐寅、祝允明、袁宏道这些明代作家给以相当重要的地位,入选的作品比较多,有不少诗

是以往选本都未收入的。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

当然,此书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论述仅是一家之言,许多看法并非定论。因此本书在编选时力求避免主观片面性,在突出体现编选者的文学主张时,又充分考虑到不同的观点,选诗尽量客观全面,从而达到观赏性和学术性相结合。

此书所收诗篇,大多直接从作者的别集中筛选,并注意选择较好的版本,同时参考了从古至今各种流行选本。不少诗因版本不同文字有歧异,则择善而从,为体例所限,未出校记。

此书面向不同文化层次的广大读者,所以对每一首诗都作了题解的注释。题解以简洁和文字介绍诗篇的写作背景、诗意主旨、主要的艺术特征和风格,以及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 and 影响,抓住要点,不求其全,不作鉴赏性的分析。注释力求简明通俗,不作繁琐的考证。在题解和注释中,广泛吸取了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因限于体例和篇幅,未能一一注明,特作此说明。

本书的编纂,采取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办法。担任选目工作的有:马美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汪涌豪(唐代),刘明今(宋代),贺圣遂、钱振民(辽金元、明代),邬国平(清代)。全部选目由马美信平衡后送本书专家选目委员会审定。担任撰写题解和注释的有:吴格(先秦),马美信、郑逸文、朱伟、汪树清(两汉魏晋南北朝),汪涌豪、邵文洁、郑利华、王瑞明、王晓华、王国伟(唐代),刘明今、丁曦林、陆灏(宋代),刘明浩、黄毅(辽金元),钱振民、黄毅、陆灏、耿百鸣(明代),邬国平、陆灏、郭建、徐时仪(清代)。全书由马美信统稿,汪贤度审阅。

马美信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于复旦大学